

革命“理论之树”常青

——重新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体会

张居华

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四十五周年了。四十五年来历史告诉我们，《讲话》经受了实践的考验。能够经受实践检验的“理论之树”是常青的。《讲话》就是这样的理论大树。革命文艺实践证明，《讲话》是不可多得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光辉文献。

同其他任何一部获得了不朽地位的著作一样，尽管《讲话》也有它的历史局限性，不可避免的有个别的提法和论断，随着时代的发展需要不断修正、完善和发展，但是决不能因此就否定它的基本原则，就要连根砍掉这棵参天的理论大树。

这决不是危言耸听。在近期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冲击下，有个别同志极力主张把《讲话》仅仅作“历史文件”来看待，实际上认为它“过时”了；还有极少数同志，为了全盘否定《讲话》的基本原则，肆意扬言要把它作为四十年代以来中国革命文艺运动中极左的总根源来批判。这都是极其错误的。

《讲话》作为革命文艺的“理论之树”，不是谁轻易可以撼动的。它的内容极其丰富，涉及一系列带根本性的文艺问题。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革命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必须与人民群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的问题，是贯穿全文的中心思想，是其精髓之所在。本文以这两个重要的基本原则问题，谈谈《讲话》指导中国革命文艺所起的巨大作用，以及对繁荣发展我国新时期社会主义文艺的伟大指导意义。

毛泽东同志在《讲话》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从分析中国革命、中国革命文艺运动发展的历史和现状出发，对“五四”运动至1942年革命文艺运动的历史经验作了科学的总结，成为四十年代我国革命文艺思想的集大成。《讲话》提出并解决了中国革命文艺运动长期探索而未能解决的一系列文艺问题。

以“五四”为起点的中国新文艺运动，一开始就遇到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毛泽东同志指出，革命的首要问题是分清敌我友。革命文艺的首要问题也是分清敌我友，即明确解决为什么人的问题。不彻底解决这个问题，革命文艺工作者就会同自己的环境、任务不协调，就会从文艺外部到内部碰到一连串的问题，就是说，既遇到文艺的一般规律问题，也遇到文艺的特殊规律问题。最早开始探索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五四”时期一些初步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比如，李大钊提出新文学“是为社会写实的文学，不是为个人造名的文学”^①，陈独秀提出“革命文学”，主张推倒“贵族文学”，建设“国民文学”，即主张革命文学是为了整

个“国民”的，不是为封建贵族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一些早期的共产党人、革命作家，继续探索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邓中夏主张革命文学应该“惊醒人们”、“鼓吹人们”起来自觉革命。蒋光慈提出革命文学应以“被压迫的群众”为出发点。“左联”提出文艺“大众化”口号，并开展了文艺“大众化”的讨论和实践，推动了革命文艺运动的发展。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毛泽东、朱德等同志领导下的中央革命根据地，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文艺运动开始在中国出现，文艺与工农兵群众有了初步的结合。抗日战争时期，党和毛泽东同志领导的延安以及其他抗日根据地的文艺运动，直接继承和发扬了老根据地文艺运动的革命传统，文艺与工农兵群众进一步得到广泛的结合。

由此可见，《讲话》确定文艺以为什么人的问题为“中心”，并非偶然，乃是“五四”运动至《讲话》前夕，革命文艺运动中的理论探索和文艺实践的历史经验总结。毛泽东同志根据我国民族民主革命的特点，从战争年代的实际出发，第一次明确提出文艺为人民大众，首先为工农兵服务。这个提法既全面，又突出了重点，即突出了人民的主体、革命的主力军工农兵，并提高到发展革命文艺的根本方向的高度加以论述，从而使这个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然而未能得到明确解决的根本问题从理论上、实践上得到了明确的解决。

在探索文艺为什么人的过程中，很自然地接触到如何实现文艺为群众的问题。《讲话》强调指出，革命文艺工作者必须走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认真改造旧的思想感情，把立足点彻底转变到工农兵这方面来。这不仅阐明了革命文艺工作者思想改造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而且指明了进行思想改造的具体途径。可以断言，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展史上，象《讲话》这样系统而精辟地论述文艺的一系列带根本性的问题，从而获得了崇高地位的文艺理论专著，是不多见的。

二

《讲话》作为我国最早出现的系统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光辉文献，它的历史功绩，也为四十五年来革命文艺发展的光辉历史所确定。毛泽东同志在《讲话》结尾时指出，革命文艺工作者，有决心走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方向，那就“一定能够改造自己和自己作品的面貌，一定能够创造出许多为人民大众所热烈欢迎的优秀的作品，一定能够把革命根据地的文艺运动和全中国的文艺运动推进到一个光辉的新阶段。”四十五年来的历史事实，充分证明了这一伟大预见的无比正确。《讲话》发表之后，广大革命文艺工作者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自觉地把改造自己的思想感情作为实现这个方向的关键，从根本上改造了文艺队伍的思想面貌。比如，我国著名作家周立波，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出身于小资产阶级家庭，早在二十年代末就开始了创作活动，1934年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1939年调延安鲁艺任教。但是，他“迷惑于资产阶级艺术”，在鲁艺任教期间，与农民毗邻而居，四年未进过一次农民的窑洞，仅有一次到延安的乡下，却“象客人似的呆了五十天，就匆匆地回到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圈子里”。他回忆起这段生活深有感慨地说，毛泽东同志所说的“灵魂深处还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王国”这句话，“是很适用于我的思想感情的”②。1942年5月，周立波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聆听了毛泽东同志的教诲，便长期扎根于人民之中。他先后深入到三五九旅部队、东北尚志县农村、北京石景山钢铁厂、湖南益阳农村，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还念念不忘深入生活，与人民群众打成一片。

随着文艺队伍思想面貌的根本变化，革命文艺得到空前的蓬勃发展，一批为人民群众喜

闻乐见的优秀作品脱颖而出，标志着我国革命文艺运动进入到一个新阶段。在不长的时间里，就出现了许多优秀作品，面目一新，不仅表现了新的题材，新的主题，新的人物，而且采用了新的形式，创造了新的风格。据周扬统计，《讲话》以后，解放区的优秀作品中，反映工农兵生活和斗争题材的占百分之九十以上。赵树理就是一位努力实践工农兵方向的、卓有成绩的著名作家。他的小说《李有才板话》、《小二黑结婚》等，成功地表现了解放区农民当家作主的新时代的新生活，揭示了蕴藏在新题材中的新主题。周扬曾指出：“他（赵树理）的成功并不是偶然的。这正是他实践了毛泽东同志的文艺方向的结果”③。

建国后，广大革命文艺工作者继续沿着《讲话》指引的方向胜利前进，取得的卓著的艺术成就也是有目共睹的。许多作家艺术家经过长期的准备和酝酿，写出了一大批优秀作品，如长篇小说《红旗谱》、《保卫延安》、《青春之歌》、《林海雪原》、《红岩》、《山乡巨变》、《创业史》，歌剧《洪湖赤卫队》、《刘三姐》以及许多话剧、电影、诗歌、短篇小说和散文等等，不仅在国内产生了巨大影响，而且不少作品在国外也享有很高的声誉。四十五年来革命文艺发展的光辉历史，无可辩驳地证实了《讲话》的基本原则是正确的，科学的。正如马克思所说的，作为革命的理论，“这个由历史运动产生并且充分自觉地参与历史运动的科学就不再是空论，而是革命的科学了。”④《讲话》是在中国革命运动中产生的，又从产生之日起，就自觉地参与中国民族民主解放运动，经过四十五年文艺实践和社会实践的检验，充分地证明了它不是头脑一时发热的空论，而是发展人民文艺的科学理论；不是什么极左的总根源，而是革命文艺蓬勃发展的生命线。历史将永远证明，《讲话》为发展革命文艺事业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

三

《讲话》不仅在历史上对我国革命文艺的正确发展，起过巨大的作用，而且它所论述的一系列基本原则，如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根本方向；文艺工作者与工农兵群众相结合，不断改造世界观的理论；文艺的普及与提高相结合的原则；文艺与社会生活辩证关系的理论；批判继承文艺遗产的理论；党的文艺工作和党的整个革命工作关系的原则等，对发展新时期社会主义文艺仍然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1987年1月27日彭真同志《在部分延安文艺老战士座谈会上的讲话》就强调指出：“历史跨进了新的时期，情况有了很大变化，但是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基本精神仍然是适用的。”

我们在前面已阐述过，文艺为人民大众、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基本原则，是《讲话》的“中心”思想，对今天新时期社会主义文艺仍有指导意义。这个基本思想，决定着文艺的性质。坚持它，文艺就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违背它，社会主义文艺就会蜕化变质，会成为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的污染工具。现在党中央提出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针，是与《讲话》的基本精神一脉相承的。它是《讲话》基本思想的合乎逻辑的发展，是《讲话》的基本精神同现阶段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表现，也是坚持和发展这一基本原则的具体表现。有人把这两个提法对立起来，甚至用现在的提法去否定《讲话》的提法，都是极端错误的。尽管今天在我国“人民”这个概念，比四十五年前“人民大众”的范围扩大了，可是工农兵仍然是人民的主体，仍然是新时期社会主义文艺的主要服务对象。

我国新时期的文艺，总的来说，坚持了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这主要表现在，几年来真实地描写广大人民生活、思想感情的优秀作品，如雨后春笋，大量涌

现，深受人民群众的欢迎。比如，震惊世界的《天安门诗抄》，抒发了人民对“四人帮”愤怒的心声；话剧《于无声处》是剧坛上的“一声惊雷”，强烈地表现了人民与“四人帮”英勇斗争的大无畏精神；小说《乔厂长上任记》是直接反映“四化”建设的佳作，成功地塑造了乔光朴这个大公无私、一心扑在“四化”建设上的社会主义新人形象；等等。许多优秀作品，将以反映新时期的新生活、新思想、新人物、新风尚和随之而采用的新形式、新风格而载入文艺史册。

但是，近期以来，有极少数人对《讲话》的基本原则发生动摇、怀疑，甚至全盘否定。他们认为“艺术的目的就在于艺术本身”，似乎作为社会实践之一的文艺创作，是没有任何社会目的的。有的人甚至提出：“文艺不是什么”，“文艺就是文艺，为什么一定要为什么服务？”这正是四十五年前，《讲话》所批评的“为艺术的艺术，超阶级的艺术，和政治并行或互相独立的艺术”的新翻版。这种连西方资产阶级进步作家也早已抛弃的破烂货，居然成了今天某些人如获至宝的新发明，岂不令人深思！

个别文艺工作者由于方向的迷失，文艺思想的混乱，公开提出不愿为八亿“下里巴人”去创作，宁可创作为少数人所理解的“阳春白雪”。他们的作品一味去迎合少数“知音”的趣味，不顾广大人民的需要，不管群众是否愿看，是否看得懂。这种人滋长了一股骄气和傲气，听不进群众的批评，甚至说：“你不爱看，反正有人爱看”；“你不懂，我懂”，“多数人不懂，少数人懂”，“今天不懂的，明天懂”等等。这说明文艺为什么人的根本问题，在少数人中还没有得到明确解决。

前一个时期，还有一些人热衷于一种所谓“新的美学原则”，认为文艺创作就是诗人、作家的“自我表现”，即只表现“自我感情世界”，追求写自我“心灵中的秘密”，不屑于表现人民群众的英勇斗争和忘我劳动，不再去赞美生活和歌颂党和人民的丰功伟绩。在他们的作品中，或者把“自我”凌驾于党和人民之上，或者把“自我”游离于党和人民的革命事业之外，或者发泄“自我”的消极颓废、悲观绝望的思想情绪，或者表现“自我”的愤世嫉俗、玩世不恭的阴暗心理，或者流露“自我”的极端个人主义、绝对自由主义、低级庸俗的情调和追求洋化的艺术趣味等等。那些一味热衷于“自我表现”、沉醉于“自我扩张”的文艺工作者，没有深入新时期的人民群众，世界观没有得到彻底改造，受到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影响，所以其作品在思想感情上与人民群众格格不入，甚至在立场上与人民群众处于对立地位，理所当然地应受到人民的唾弃。要改变这种不正常的局面，唯一办法就是如《讲话》所说的，长期地无条件地深入生活，在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学习社会的过程中，不断改造世界观，清除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影响，从实际上、行动上彻底解决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问题。

我们应该真诚地学习和研究《讲话》，坚持和运用它的基本原则，并在实践过程中不断完善、丰富和发展它，使这棵根深叶茂的、常青的“理论之树”，为新时期社会主义文艺的繁荣和发展服务。

注释：

- ① 《什么是文学？》，《李大钊诗文选集》第72页。
- ② 均见《谈思想感情的变化》，《文艺报》1952年第11、12期合刊。
- ③ 《谈赵树理的创作》，见《表现新的群众时代》一书。
-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58页。